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

全球100名专家献策中国改革

GLOBAL 100 TOP EXPERTS
OFFER SUGGESTIONS
ON CHINA'S REFORM

第二次 革命

经济卷

 中国长安出版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

全球100名专家献策中国改革

GLOBAL 100 TOP EXPERTS
OFFER SUGGESTIONS
ON CHINA'S REFORM

第二次 革命

经济卷

 中国长安出版社

第二次革命

SECOND REVOLUTION

经
济
卷

目 录

中国“巨人症”

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紧急开动印钞机,希望在金融市场遭遇流动性枯竭濒临崩溃时以政府之力推动市场重新运转。中国政府被全球媒体捧为刺激政策力度最大者。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本是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传统智慧,但今日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全球经济的境况,已远非这些政策发明之时可以比拟。在前所未有的政策刺激下,资产市场中的泡沫已经抢在实体经济恢复前向我等跑步而来。通胀预期加剧,股票市场疯狂,房地产地王频现、价格飙升已近迷狂,即使是被公认的“疯狂 2007”,恐也难望其项背。

- 002 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出路 / 吴敬琏
- 011 跑步进入泡沫经济 / 袁 剑
- 015 中国经济发展不能釜底抽薪 / 武建东
- 020 201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扩张阶段
/ 郎丽华 张连城
- 025 魏柳南:一个法国汉学家看中国 / 张 弘

垄断行业改革别“打补丁”

基于目前的经济格局和制度设计,与民生攸关的各种听证会成了“听涨会”,电信行业改革是今天一个套餐明天一个套餐,把客户兜里的钱全套进去了。消费者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丝毫的发言权,只有“被改革”。更有甚者,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垄断行业——行政垄断,权利介入市场,成为最昂贵的商品,与资本相互勾结,形成了“权贵资本”和“资本权贵”。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垄断行业总在“打补丁”。

- 034 国企分红迈上改革路 / 周明生
- 042 预算让国资管理透明化 / 贾康
- 046 国有资产立法需明确六大问题 / 李曙光
- 053 电信“三国志” / 鲁照旺
- 058 反垄断法尚待亮剑 / 胡健
- 063 “新国资运动”隐忧 / 韩雪田天
- 071 电信破垄,直逼产业结构调整 / 刀锋
- 078 煤电矛盾催逼电价改革 / 柳茂君
- 083 地方国投公司的无奈 / 李建中

税制改革需要“清淤”

我国的税收体制一直存在着“双轨”,改革开放初期还实行内外有别,再加上原来改革前一路沿袭下来的各种“费”的征收,使中国的税收体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费”改税积重难返、税种税率的不合理结构等问题淤积在一起。虽然当前税制改革有了基本思

路: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围绕统一税法、公平税负、规范政府分配方式、促进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的目标,在保持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的前提下,适应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积极稳妥地分步对现行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改革。但关键是“清淤”,疏浚河道才能确保税源。

- 090 推行以减税为目标的税制改革 / 李炜光
094 目前最急需的是发展第三产业 / 史瑞培
097 央行民债:流动性过剩特效药 / 盛宇明

“税”“费”改革应彰显各自责任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依据其社会职能,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地、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形式。费是指国家机关向有关当事人提供某种特定劳务或服务,按规定收取的一种费用。从两者的概念上一眼就能明白税、费各自的作用。但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长期以来形成的税、费体制使两者经常含混不清,税外加费、费外加税、税费同时征收的现象屡见不鲜。随着农业税、义务教育学杂费等相继免征免收,税费改革正在争议中缓步爬行。

- 106 减税:一个转型社会正在进步的标志 / 李炜光
114 一两年内是增值税改革的最佳时机 / 李炜光
121 初次分配,税收调控大有可为 / 安体富
124 农村产权改革中的税收问题 / 冷文娟
127 资源税改革:关键在于定位 / 刘尚希

129

再议林业税费改革 / 王立飞 曹文

变味的“与国际接轨”

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流行语之一。在“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建起了自己的“标志性建筑”，听证会与国际接轨后演变成了“听涨会”，燃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后越接越高，银行办事与国际接轨后队越排越长，电信价格与国际接轨后花样不断翻新……“与国际接轨”的流行，一方面证明中国彻底摆脱了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窠臼，标志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步，然而，笼统地强调“与国际接轨”容易导致观念上的误解和偏差，造成动作变形，食之苦涩变味。

136

油改：不止于油价 / 贾存斗

144

油价国际接轨的陷阱 / 陈宇峰

147

人民币加速国际化 / 柳茂君

154

崛起机遇，人民币如何作为 / 蒋卫武

160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路线图 / 武建东

165

改革结算制度 以防外汇“虚高” / 郭田勇

非公经济已非“庶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这是典型的中国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背景。经过30年艰苦奋斗，如今，非公经济不仅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参天大树，而且取得了一个正式的“名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非公经济领域“国进民退”之风的愈演愈烈也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危机到来之时刺激复苏的政策果实让国企独吞,非公经济在取得30年辉煌后反而成了“庶出”。

- 170 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意义 / 袁啸云
- 176 关于当前成都民营经济发展的思考 / 何绍华
- 180 应设非公经济的主管部门 / 段永基
- 183 2009,民企五大案例背后的政商关系 / 钱 晨 贾存斗
- 192 温州突围 / 刀 锋
- 198 构建企业创建强势品牌的政府支持体系 / 祝合良

民营企业:十大“危”“机”观

民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同时对中国GDP的增长、市场经济的活跃以及国家税收的增长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文化、社会、法治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民营企业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管理体制和公司机制的不成熟,导致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青春期综合症;家族化管理……致使民营企业到三十而立时遇到了许多发展瓶颈。民营企业自身也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无力突破体制的高墙,依然在夹缝中求生存。

- 204 能产生高就业的企业就是优秀企业 / 武克钢
- 207 民营企业也是社会的企业 / 宗庆后
- 209 留下一口气,就有机会 / 张思民

- 211 同等待遇,民企会大发展 / 王 劲
- 213 民企资产积累要靠自身 / 李东生
- 215 民营企业不可不高兴 / 尹明善
- 217 民营企业要学会珍惜 / 蒋锡培
- 219 民企是从“冬天”出来的 / 黄 鸣
- 221 还是要坚持市场化原则 / 陈妙林
- 223 振兴经济最重要是振兴企业 / 何清华

股市已不再是经济的晴雨表

从理论上讲,股票价格最终取决于公司的收益和利润,正因为如此,股市被称做“经济晴雨表”。然而,由于美国金融市场衍生品的过度创新,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危及实体经济。当危机袭来时,世界各国纷纷联手救市。中国4万亿投资政策出台后,银行新增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入国企,中小企业依然资金紧张。大型国企囤积的资金相当一部分进入了股市楼市,未能进入实体经济。银行信贷资金在运行中的这种变异,使企业不愿投资而倾向于投机,造成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基本面。

- 226 好股市是只难熟的苹果 / 章玉贵
- 228 股市暴涨暴跌根在制度缺陷 / 谢百三 李政东
- 235 判断股市探底的五条标准 / 谢百三 傅连英
刘美欧 张 磊
- 242 股市已丧失“经济晴雨表”作用 / 刘翔峰

危机中的契机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世界经济的全面衰退,而且也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虽然我们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北京共识”逐渐演变成“全球共识”。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与挑战。我们能否实现自身发展方式转型、发展低碳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从政策刺激走向结构性变革,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下有效扩大内需、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如何推进城市化进程,如何走上绿色复苏和低碳增长之路,等等,都成为我们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 246 未来三年对中国至关重要 / 石小敏
- 248 金融体系由“专用道”走向“通用道” / 曹远征
- 252 经济危机与政府治道变革 / 毛寿龙
- 256 不确定性考验政府宏观调控 / 周明生
- 263 化解通胀靠深化改革 / 胡玉平
- 270 金融危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 / 郭树清
- 280 危机中的金融创新 / 蒋卫武 许立新

“三农”改革应站在大多数人一边

30年前,小岗村率先提出包产到户,冲破人民公社制度的平均主义;30年后,小岗村的农民顺应时势,形成土地合作组织,由单打独斗回到集体力量。毋庸置疑,小岗村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符号。小岗村农民献给中国社会变革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陈列在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里的18位农民的手印。小岗村只是中

- 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80%,这部分人如何致富、如何稳定,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文明和谐的根基,“三农”稳则国稳,“三农”强则国强,“三农”富则国富。
- 288 小岗村的制度遗产与标本价值 / 刘守英
- 292 这是农民组织兴起的时代 / 于建嵘
- 296 最主要是尊重农民的意愿 / 吴 象
- 301 成都:土地确权进行时 / 杜 娟
- 307 还权赋能是农村产权改革的核心 / 陈家泽
- 310 农民能力建设从公共服务改革开始 / 刘尚希
- 314 创造农民工自由选择就业形式的条件 / 白南生 杜 珂
- 316 中国土地权利改革路线 / 武建东
- 322 建议根本改革征地制度 / 刘守英 叶红玲
- 327 探讨农民对城市土地的权利 / 蔡永飞

农地流转:上了弦的箭

当前,土地违法的局面已经到了历史高点。土地乱纪导致了政治危机,地方政府公司化,以自己利益为主的同时,虽然也带来了城市的高速发展,但这是在一个不完善的体制下采用的方式。农地更兼有社保的功能,因此农地流转除了转让金还必须进行社保补偿,但现实中农民获得的农地流转补偿却被层层“剥皮”。政府不能再担当土地流转的主体,不能再经营土地。农地流转改革已是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且刻不容缓。

- 332 搭在弦上的土地变革之箭 / 韩 雪
343 小产权房是改革的历史欠账 / 武建东

能源：关键时期的关键革命

能源关乎国运。2008年8月8日，国家能源局正式挂牌成立。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标准规范是其三大主要功能。然而，国际国内能源形势日渐严峻，注定了能源政策和战略选择上的艰难。金融危机使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缓和，为能源行业“休养生息”、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提供了重要机遇期。在这个机遇期，可以创新性的技术彻底改造中国的能源体系，革命性地建造支撑未来二三十年的能源生产方式，将我国延续百年传统的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大体量地提升到全球先进水平。

- 352 能源关国运 / 张国宝
358 中国能源改革路径选择 / 武建东
365 能源竞争 时不我待 / 潘重光
367 节能是一个长远国策 / 杨裕生
371 为煤层气而战 / 魏 群 杜 娟

综改试验区：中国改革的深水实验

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对容易完成的改革任务基本上都已完成。伴随着体制转轨、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各种矛盾集中暴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涌现，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这使得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加，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

和风险性超出了先前的预期。因此，新的历史时期，对改革的综合性和配套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已经迈入“深水区”。2005年6月21日，浦东新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由此揭开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新篇章。

- 382 综改试验区：“上下联动”深化改革 / 杜珂
- 388 为什么深圳当了排头兵 / 徐景安
- 393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新阶段，新使命 / 迟福林 方栓喜
- 398 综改试验区：领跑下一个30年 / 《中国改革》编辑部
- 403 做正确的事 正确地做事 / 葛红林
- 405 重庆综改的三条主线 / 杨庆育
- 407 激励创新，宽容失败 / 李宪生
- 409 在“好”的前提下保证“快” / 阮成发
- 413 对改革开放试验区的试验性思考 / 卢斌

中国“巨人症”

- 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紧急开动印钞机,希望在金融市场遭遇流动性枯竭濒临崩溃时以政府之力推动市场重新运转。中国政府被全球媒体捧为刺激政策力度最大者。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本是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传统智慧,但今日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全球经济的境况,已远非这些政策发明之时可以比拟。在前所未有的政策刺激下,资产市场中的泡沫已经抢在实体经济恢复前向我等跑步而来。通胀预期加剧,股票市场疯狂,房地产地王频现、价格飙升已近迷狂,即使是被公认的“疯狂2007”,恐也难望其项背。

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案、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 2007 年下半年浮出水面，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危险。

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出路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 3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于是，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題，就成为一个不但关系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走向的世界性问题。

中国经济“两头冒尖”

虽然前一个时期国内有极少数人鼓吹“今不如昔”，现在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如“大跃进”时期之类的论调，但是从国际社会上对中国的议论看，所有尊重事实的人，不管是对于中国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或者

是采取一种怀疑、敌视的态度，都一致肯定，中国的经济在近 30 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 18 世纪后期 19 世纪初期西欧国家“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在社会大转型期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地去对待它，去解决它。不能不承认，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天堂”的反方向发展。

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推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或准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这样的资源，就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困难。环境的恶化更不用说了。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使得有些地方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外一个贫富差距的扩大。以上这些，是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天天都能接触到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根据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近 30 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 GDP 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大致上 75:2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微低一点。在有些阶段，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可

能高一些。比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投资率就达到30%以上。又比如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也没有超过35%。中国现在投资率越来越高，特别是21世纪以来，基本上处于45%~50%的水平，而消费比重严重偏低。这种类似于马克思分析过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偏差，造成了一系列例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问题，以及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它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快速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浮出水面，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性还在于，它还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严峻挑战来自何处

为了解决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它们的根源何在。中国经济学界最近几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根

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就是内外失衡以至于它的宏观经济表现——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等等，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或称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这个正确的发展思路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且不说苏联早在 60 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我们自己 1995 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也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10 年以后，到了 2005 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十一五”第一年执行的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 2007 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在 2003 年到 2007 年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通过深入观察，提出了很深刻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是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1992 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却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配置的。